

# 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叙述视角

许 辉

(黑龙江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本文用叙事学的理论,评论王安忆的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认为这篇小说采用了照像式的叙述视角,客观真实。淡化情节,注意表现原生态的生活,并体现了现实性与诗性的结合。

**关键词:** 叙述 视角 情节 诗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3)04-0117-03

## About the Narrative Angle of the Novel "Plant Red Caltrop Up and Plant Lotus Down" by Wang An-yi

XU Hui

(Literature Colleg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Helong jiang)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the narrative theory to comment on the novel "Plant Red Caltrop Up and Plant Lotus Down" by Wang An-yi. We hold the view that this novel accepts the narrative angle of taking a picture. It's objective and true. It is important desalinate plot, pay attention to display the original life, and embody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poem nature.

**Key words:** narration angle plot poem nature

王安忆近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是继她的成名作《六十九届初中生》、转型作《纪实与虚构》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未成年女孩的叙述视角创作的作品。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练,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与《六十九届初中生》相比,笔法老道从容了许多,文化内涵丰富了许多,但以少女的视角进行叙述的创作方式仍未改变。

### 一、照像式的叙述视角

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通过小主人公秧宝宝的眼睛和心灵感受日常生活的冷暖和世事的变迁,显示了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心灵智慧、人生感悟。下笔老道从容,似乎漫不经心又处处精雕细刻,不着痕迹。这种叙述方式是她自 90 年代以来“生活流”

小说的延续,这类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小天地。

以九岁的小孩秧宝宝的眼睛反映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似乎太狭窄了,因为主人公毕竟是一位只有九岁来自农村的寄托在别人家的小女孩。但我们在作品中却丝毫感受不到因为叙述视角受限而使表现的笔力受阻,相反却因孩子的目光而漫无边际、无遮无拦。看到什么写什么,看到谁写谁,似乎没有聚焦,没有选择。所以内容庞杂,头绪繁多。人物则是出出入入,有时让读者忘了主角是谁。可见本部小说创作视角虽非全知全能的叙述,但叙述效果却是开放的全景式的。嘈杂纷乱的画面其实是由非常明晰的两大场景构成的。一个是秧宝宝生活了九年,刚刚离开的江南农村沈淙,一个则是距

收稿日期:2003-03-04

作者简介:许辉(1964-),男,汉族,黑龙江尚志人,黑龙江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沈淙三四里路的与城市交界的小镇华舍镇。

秧宝宝是一位敏感、机灵、倔强、认生、害羞的小女孩，她的童心世界还是半明半暗，混沌一片的。当她带着新奇又有些惶恐的童真，来到寄宿的李老师家生活时，李老师一家的善良而又时常忽视她。强烈的自尊使秧宝宝常常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躲到僻静处舔舐伤口，而沈淙荒败破旧的老屋就是她静静养伤的最好去处。老屋虽然荒落了，但在秧宝宝的眼中却是繁荣的，似乎是鲁迅童年中的百草园，萧红童年中的后花园。这里的一切都带着旧日的温情，隔壁木讷、善良、倔强的看房子的老公公是小女孩的精神依恋，只要看到老公公，她那惶惑的心境便会安静下来。王安忆笔下的沈淙是一个已被工业化大潮逐渐淹没的农村的缩影，破败凋敝，人丁不旺，村里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赚钱，剩下的只是老弱病残。一矗矗无人居住的明窗亮瓦的新楼房更显出老屋的颓败。但正是这里的灰尘，散乱堆放的旧物，横卧竖爬的瓜藤，才让秧宝宝漂泊的、孤独的心安定下来。

小镇华舍屋虽小，却也五脏俱全。有高速公路，也有水田；有公交车也有拖拉机；有霓虹灯也有未被污染的月亮；还有许多打工者和他们的故事，以及妓女黄久香式的精神人物；有茶楼、酒楼、影楼。作品中的小镇既有寂静，安闲的一面，又处处显示着蒸腾的气象。中年人忙于赚更多的钱，秧宝宝的父母到温州闯荡天下，蒋芽儿的父亲小心翼翼、脚踏实地地发了财，东北汉子们背井离乡的艰辛，闪闪创业的艰难曲折，黄久香为了生计出卖色相等，这些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便构成了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缩影。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因为九岁女孩的眼睛而失真，也没因为看世界的眼睛只有九岁就充满了天真。

## 二、淡化的情节

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给予了极致的重视，所以形成一种看似未经梳理的、松散的叙述模式，它的审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小说对江南小镇向城市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世俗风情，在世态人情中酝酿着丰富的感情潜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节进展没有明显的因果逻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太多关联甚至一点关联都没有的个人的故事和单个的场景，读者几乎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嬗变和矛盾冲突的展开，但江南风情民俗的描写却异常活跃生动。

小说人物设置、场景的出现完全以九岁女孩秧宝宝的视线很随意地组织进小说里。如秧宝宝家看

屋的公公，他疏离在故事情节之外，但在小说中却是一个不是主角的主角，作者赋予这个人物非常深厚的文化色彩，他是讲究礼数的传统保守文化的代表人物。礼义轻到给秧宝宝妈妈送一块火腿，答谢她能给他一个栖身之地，给秧宝宝送去一个新结的葫芦，为秧宝宝留着新生的鸡蛋。事情虽然细小，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葫芦、新生的鸡蛋，温暖着秧宝宝那颗自尊、敏感易受伤害的心灵。他坚决不进城和儿子一起生活，宁可一个人固守破败的家园，说明他的乡土意识深重。他为自己选棺材的事轰动了小小的沈淙，使公公成为沈淙的中心人物，也成为妨碍火葬政策贯彻的老顽固。但公公依旧我行我素，只管精心打造自己的棺材，这一情节和秧宝宝的性格发展没有因果关联，却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重土地、重人的归宿感、重灵魂复生等传统意识。公公代表着一个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代表着另一种即将结束的传统生活方式。

小说中有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尤其是对农村沈淙景致描写，使乡村呈现出雅致与优美的境界。破旧但温馨的后花园、乐天安命的老公公，能让躁动不安的心静下来的散板歌谣“上种红菱下种藕”……，使小说浸染着宁静和谐的传统文化氛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与骚动，势利与浮华。乡间的景色描写也极富画面感：

“太阳光里的那一种姜黄渐渐地收走了，换来了比较透明及均匀的光线。后园里的景物在细腻的光线之中，显得不那么芜杂，而是很精致。每一缕草叶都变得纤长柔韧，交错在一起，形成美好的图案。那些肥厚的大叶子，边缘都很清晰，有立体感，一叶覆一叶，也排成图案，方才被秧宝宝理出来的、刻了祖先名字的石头，非常洁白地镶在一园绿色中间，身后的香椿树，树干上的褐色斑痕，皱褶，全是井然有序，流淌着舒畅的线条。树冠，可真大呀！垂垂挂挂着，那绿，又是一种，带些蓝的莹绿。公公的黑布衣裤，袖是齐肘的，裤管则齐膝，已经洗出了布筋，这会儿，也丝丝可见。公公捏了一把葱绿的香椿，用根麦草系起来，举着。脚在藤蔓里拔出来，放下去，拔出来，放下去。这一切都是如画的，秧宝宝自己也成了画中人。”

像这样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在小说中有很多，交织成一幅幅优美的田园风光。作家以散文文化结构和笔调，抒写了对乡土的眷恋与对传统回归的渴望。

另外，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风俗、掌故、人生经验，这些都使她的小说体现出一种亲切、自由的风格。但同时也弱化了情节，秧宝宝碰到什么，见到什么，就写什么，可以说枝节纵横，旁逸斜生。如由黄久香去包公殿拜千人佛，引出抽签、拜佛、以及和

尚诵经等道门佛事；由老公公找木匠做棺材，引出江南水乡打眠床的风俗；由吃饭写到如何做鱼圆……总之，给人的感觉是拉拉杂杂，没有一个是重要的。但如果除去这些，小说就什么也没有了，看来小说就是由这些流动的生活画面组成的。这一特色和汪曾祺的小说非常相象，笔法如行云流水。这种生活流的写法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虽然早已存在，但如此这般散淡与不经意，流淌着如此浓厚的文化气息，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也是少见的。

王安忆在《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六十九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中，叙述者把叙述视角聚焦在人物的幼年时，都采用了极为孩子气的语言，把人物的性格成长放在首位，不着力于凸现历史内容、政治事件，不体现社会理想和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但这三篇小说中的三个小女孩却发出了不同的叙述声音。《六十九届初中生》从婴孩的视角和语言写起，随着聚焦人物的成长，叙述语言也逐渐成熟。《纪实与虚构》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叙述视角与语言，展现了“纪实”与“虚构”的社会画面与家族史。其中，“纪实”部分小女孩的叙述视角给读者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以天真幼稚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虚构”部分叙述者“我”以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讲述了一段充满英雄浪漫传奇色彩故事。《上种红菱下种藕》同是小女孩的叙述视角，但效果却迥然不同，虽然作者尽量用女孩的眼光取代自己的眼光，让读者直接通过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世界，但作者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眼光，通过无目的地转换，以多侧面和共时性，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平静与焦躁，老守田园与闯荡世界交融的立体生活状态。由于散文化倾向鲜明，作品在弱化情节时更突出了内容的客观性、抒情性和诗性，对外部生活经验进行模态化的呈现。所以王安忆在小说中又一次展示了她的创作理念，即小说并非是

一种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表现人类精神存在的“生命形态！”

在王安忆的“生活流”小说中，对草根阶层人物的琐碎、卑微的日常生活描写并没有取代她特有的诗性抒情，而是形成难以抑制的一股浪漫冲动中的暗流，作品中总能闪现出她对美好人性的诗性捕捉。

在这篇小说里，王安忆明显把小说分成两个叙述板块，即秧宝宝寄宿生活的华舍镇和她的家乡沈淞。秧宝宝在华舍镇的生活，作者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通过秧宝宝看到的、听到的、感悟到的描写了一幅小人物的人生百态图，有新写实小说的叙述风格。写世俗人、自然状态的人，并且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是非性格化的。可在对沈淞地描写中，作者以的抒情诗的笔法，营造了浓厚的乡土田园气氛。

不仅注意写情，而且善于造境，主要是通过老公公和他家的后花园，表现了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环境描写对象化、审美化，在这里淳朴、健康与原始蒙昧并存，优美与平庸交织，达到了人和自然的水乳交融。这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格，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边城》很相像。叙述方式与汪曾祺的《受戒》很相似。作者在这部分把小说文化品格提升到了一个超越现实的高度，使小说不仅仅停留在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而是更深层地表达了人类精神存在的“生命形态”。在这里充分体现了王安忆的小说理念，即：“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写小说的毕生要努力解决的东西。”<sup>[1]</sup>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心灵世界 [M]. 上海：复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吴惠敏